

原道

从“彼此契合”中理解“第二个结合”

■ 马振江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掌握它们的契合性,我们不能只关注它们在概念上的相似性,更应深入探究其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揭示它们在各个精神层面的交融和兼容性。”

宇宙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运用整体性思维来把握人与宇宙的关系,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在这里,人与自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互不影响的对立实体,而是共存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具有一体性和同一性。恩格斯也提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这一观念表明,人类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受动的和能动的。只有通过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才得以实现。这一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高度契合。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宇宙观构筑于对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深刻洞察之上,注重强调连续性、动态性、关联性、关系性以及整体性,而非静止、孤立、实体或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观。例如,老子的“道”概念,便将道比喻为天地万物之母、之母之本源、之初始。《易经》中的“道”将天道、地道、人道三者融为一体,其中“天地”被拟人为万物之母,一切生物皆由其内在的创生力量“生生”而来。庄子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提出“人与天地共生共存”的观念,阐释了对于宇宙万物相互关联和统一的认知。另一方面,孟子主张“亲亲仁民爱物”,认为人应对亲人的爱心扩展至邻人、百姓,乃至万物万类。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的“一体之仁”理念,更是将人的仁爱之心从“爱人”扩展至“爱物”,将人与天地万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所包含的思想元素,不仅涵盖了朴素的宇宙整体论,更包含了辩证的发展观等。这些思想元素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起源、事物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相通之处,也进一步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契合性。

全面而深入地发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不只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课题,更是一个需要我们秉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来推动的实践性课题。在强调两者相契合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这种契合性所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根本动力、运行机制以及实践主体。

认知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在认知观的范畴内,具有明显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将人的社会生活视为本质上的实践活动,并视实践为认识的起始点和基础,也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同人们的物质交往,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这表明实践是认识的直接来源,并且认识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也只有依靠实践的推动才能发展。只有坚持实践观,才能对认识的发生、发展、目的、作用以及真理性的标准等认识论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认识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把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与客观实在过程的辩证法统一起来,成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中国传统哲学以“知”与“行”的关系描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尚书》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中的“非知之难,将在行之”,以及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等诸多经典之言,都将“行”视作认识的最终目的,认为只有有效的行动才能证明知识的可靠性。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张载的“有物则有感,物格而后至”,王廷相的“事物之实接于见,事理之精契于思,事机之妙得于行”以及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观点,看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知与行的紧密关联和相互检验的重要性。特别是王守仁的观点,他将知与行视为一体,强调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行动来实现,没有行动的知识并不能称之为真知。这些观

点强调了知与行的关系,重视实践的价值,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服务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社会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公平、正义、和谐的理想社会追求上具有显著的共通性。马克思主义最高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基础是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受阶级关系的决定,人们构成了“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与公平正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之上。他们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关爱、命运共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与“大同”社会所描述的“天下为公,人人各得其所”的状态有着显著的共通性。“大同”社会主张生产资料全民公有,物质财富能满足人们的生存发展需要,劳动不再是人们生存的手段,而成为自愿的活动。实现“天下为公”,需要人们不仅亲近亲人,也爱护他人,需要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公正地办事,使国家和谐有序。“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句话展示了人们有高度的责任感,爱护他人,需要有序,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崇尚善行,重视诚信,讲求礼义,尚重和合。总的来说,在儒家所设想的未来“大同”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形成一个团结和睦、协调亲密的和谐社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思维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包含对立统一理念的思维方式,强调以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变通思维和辩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生生不息”的变易观念和辩证的辩证方法论。如《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体现了一种辩证思维,即“生生不息”的发展观念以及阴阳、刚柔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再如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强调的是对立面的依存与统一,暗示了对立并非绝对,对立面的依存是永恒的,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相反者相成。这些思想展示了老子深厚的辩证思维。孔子的“执两用中”以及孟子的“经权”思想等,都包含着辩证的思维。特别是孔子的“执两用中”,在强调两端的对立基础上,追求“用中”的中和境界,反映了一种关注变易、灵活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传统的辩证思维具有显著的相通性,都体现了联系和发展、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

全面而深入地发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不只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课题,更是一个需要我们秉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来推动的实践性课题。在强调两者相契合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这种契合性所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根本动力、运行机制以及实践主体。我们的出发点不能局限于表面相似的局部契合,反而应从更广阔的民族的、历史的、全球的视角出发,抓住问题的实质,深挖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此外,我们不可忽视具体的国情和时代特征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我们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事求是,避免抽象的分析和偏颇的概括。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中华文明的历史原创性及其当代意义

■ 姜义华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思享

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创世的不是神灵,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各种文明要素的发明者、创造者。比如,有巢氏是发明巢居的英雄,燧人氏是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的英雄,伏羲氏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结绳为网以渔,神农氏教民耕种,食五谷,还尝百草,创医学,黄帝用玉作兵器,造舟车弓箭,染五色衣裳,嫫祖教人养蚕,仓颉造文字。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他们之所以一一以氏为名,表明各种文明要素的这些发明者、创造者,并非一个个孤立存在的个人,而是融合个人于其中的一个个社会群体。

中国古史的这些传说,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原创性,就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人、人类、人类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超越人间的神明世界为本位,也不是以和人的存在毫无联系的物的世界为本位。而《周易·贲卦》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是中华文明这一历史原创性最为经典的概括。郑玄为这一段论述所作的注指出:“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观天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文,则化成可知也。”刚柔交错,所述的是自然界的矛盾运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通过观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动,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文明以止”,北宋程颐说:“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谓处于文明也。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强调以人所创造的文明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通过深入地观察与研究人、人类、人类社会走出蒙昧、走向文明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推动文明由天下人所共创,文明的成果为天下人所共享,从而保障人、人类、人类社会得以沿着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向前发展。

《尚书·泰誓》记述周武王一段名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为贵,尤其民为本,是中华文明中文化化成的起始点。《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庄公十四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决定国家命运的是人民大众而非神灵。《老子》中强调:“天地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尽心》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论述都非常清晰地说明,正是这些现实的具体的人,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这些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方才是文明生成和成长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他还明确地指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很直白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能动、全面的人,其实就是自由而全面的人;僵化、“单向度”,就是不自由、不全面。“文化”的人,是对于《周易·贲卦》中“文明以止,人文也”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简洁清晰的诠释,而物化的人,则是指那些为图腾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所控制的人。

中华文明这种历史原创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所有文明中唯一一脉延续至今而且历久弥新的文明。在中华文明中,人很早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人的存在,乃是社会性的存在,群体性的存在。人和自然的联系,人和终结关怀的关系,都不容置疑地是社会的行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从草昧到文明,中华文明的不断前行,都和人的群体性联系的不扩大、不断强化,人越来越能够自觉地、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每个人都能够能动地、全面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华文明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人的能动的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历史原创性,不仅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全体成员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团结奋进,而且使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命运与共,成为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把握主题教育“同题共答”的理论基础

■ 胡兵

“同题共答”是指各级指导组、各单位等不同主体运用不同的方法开展主题教育,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并且进行竞争性的比学赶超,从而更好地完成目标任务。这是主题教育重要的方法论,其形成有内在的逻辑机理,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以来的勇于探索、艰苦奋斗精神,与毛泽东的“赶考观”、新时代“答卷人”命题是一脉相承的。

源自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观”

从1921年列宁强调“我们是会考及格的”,到毛泽东把即将执政比喻为“进京赶考”,“赶考”一词实现了从传统文化语义向政党政治隐喻的创造性转化。回溯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赶考”融入自己的基因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救国大考”中成功答出了毛泽东思想,答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兴国大考”“富国大考”中,先后成功答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答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强国大考”中答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主题教育中,我们要学习“浦江经验”,就是要以新的“赶考”精神对待信访工作,把来信访群众当考官,把信访案件当考题,答出群众满意的答案。这也是“同题共答”的基础逻辑,以赶考的精神状态,努力答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答卷。

新时代“答卷人”命题的延伸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又将面临新的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沉浸式光影技术手段呈现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考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无论面临多么艰难的考题,我们都要适应时代之变,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走好“五个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交出优异答卷。面对主题教育这份答卷,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赶考者、都是答卷人。“时代出卷”是提出问题。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时代考卷常出常新,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困境,我们都要把牢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我们答卷”是解决问题。新征程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要始终保持“路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豪情,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新征程中交出优异答卷。“人民阅卷”是评价效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逐步提高,答卷的标准必然随之提升,我们必

须始终以高昂的斗志迎考答题,赶考永远在路上。

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同题共答”就是面对同样的考题,交出满意的答卷。在主题教育中,最根本的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系统学习好、融会贯通领会好,深刻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一是共同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各级党委中心组率先垂范,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带动身边党员干部静下心来深入研悟。二是以调查研究直击发展问题,奔着问题去,向着难处改,聚焦高

质量发展难题,下足调研实功,把问题清单转化为责任清单、发展清单。三是以奋进姿态推动事业发展,破难题、办实事、解民忧,让主题教育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四是以刀刃向内进行检视整改,深入查摆不足,抓好突出问题的整改落实。五是坚持不懈抓好建章立制,把好做法好经验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并建立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从而让每位党员干部切实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在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切实达到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的目标。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